

柴德賡 著

史籍舉要

北京出版社

史籍举要

柴德赓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11,000 字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20,000

书号: 11071·185

定价: 0.98 元

序

敬爱的柴青峰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这本《史籍举要》主要是根据柴师在江苏师范学院讲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课的手稿和部分油印本讲义整理而成。参加整理此书的是他在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过的学生邱敏、胡天法和许春在三位同志。我只做了一点审订和修补的工作。当我们重新读到柴师字迹飘逸而有神的手稿时，他的风采，他的言谈，他的诲人不倦、时刻关心青年成长和数十年如一日勤奋不休为党工作的形象，又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为了纪念柴师，也使大家获得更多的史学入门的知识，从而提高自学的 ability，为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添砖加瓦，我们才不揣冒昧，不顾水平的限制，把这本书奉献给广大的史学爱好者。

柴师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首先，我们应当学习他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是陈垣老登堂入室的弟子，是陈垣老的传人之一，如果能留在北京伴随陈老，对于他进一步搞科学研究是非常有利的。他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职，是师大历史系的系主任，但在1955年，为了响应党的支援兄弟院校的号召，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奔赴正在期待着他的江苏师范学院。在那里，党给他很多任务，又是民主党派的工作，又是系行政的工作，还要开设繁重的课程。他对工作极其负责，待人接物，热情洋溢。1962年，我们随翦伯赞老到苏州为《中国史纲要》一书定稿，曾得到柴师大力的协助。他不但给我们以人力和图书的方便，又多次抽暇亲自

参加我们的讨论，在讨论中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些动人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翦老请他来北大讲学，蒙他慨然允诺。1963年，在他来北京的短时间内，曾给北大历史系开出了史料与史学一课。这门课与《史籍举要》的内容基本相同，很受同学欢迎。他并且多次到中央党校讲课，还为高教部编写教材，每日工作至深夜。这都是他对人民、对工作负责精神的具体体现，而这些只不过是其所见到的一鳞片爪而已。

其次，柴师坚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改造学科的治学精神，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就以本书为例，尽管其目的是为了介绍史学入门知识，但他从未放弃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述这些古代的史籍。他对《史记》予以极高的评价，指出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从体例到内容都表现了他对农民起义和起义领袖的充分同情，这在二十四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他认为范曄《后汉书》增入列女传，所收才行高秀的妇女十七人，“正史”中的列女传自此始，这在封建史书中也是难得的，应当给以肯定。他对刘知几《史通·人物》篇认为后汉的蔡琰（蔡文姬），因曾改嫁，就不宜为之立传，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还指出，此后“正史”的列女传实际上成为烈女传，反映了士大夫浓厚的夫权思想的发展，这更是十分荒谬的事。本书的政书类还指出，历朝的典章制度，从总的看都是属于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上层建筑的范畴，但杜佑《通典》把食货列在第一，这是前史所没有的，是杜佑的首创，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杜佑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与那些离开实际生活高谈礼乐的观点有显著的不同。又如他在论述《明史》的时候，把《明史》的内容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起来，使人感到在这样复杂条件下发生的史事，已远非《明史》一书所能囊括。以上这些看法和处理方法都是十分中肯而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总之，他在讲授此

课时，始终是注意怎样把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介绍给同学，使同学们少走些弯路，尽量做到使历史研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基础之上。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柴师殚精竭力地关心和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的精神，也是我们需要向他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青年们的教导，不仅体现在他的书中，诸如那些深入浅出而细致的叙述和分析，不厌其烦地介绍给青年要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哪些书要精读，哪些书要浏览，哪些书要参考，哪些书为我们提供第一手资料。还有治学方法要严谨，要尽量避免发生错误，要确切、熟练地掌握史学基本知识和技能，要对具体史实作具体分析。这一切，都对后学有所启发和帮助。即或在他讲课期间，只要同学们有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又无不做到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增强对方学习的信心，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更可贵的是，他不但关心那些基础较好，反应较快，思想敏锐，学习拔尖的青年，对学习程度较差，反应较慢，但又有志于学习的人，也同样给以耐心的指导和极大的关注。我在解放前就是他的学生，而且是属于后者之类的，后来我们见面的次数虽不多，但他一遇机会，总是给我以莫大的鼓励和支持。上课前找他，他帮你备课；写文章找他，他教你要摆事实，讲道理，教给你与人商榷时不要火气太重，或出语伤人。1963年他在北大讲课，无论是在课堂上，或是在宿舍里，几乎每天都有很多青年同志把他包围着，有历史系的，也有中文系的，有同学，也有青年和中年教师，去敬听他的谆谆教诲。他平易近人，来者不拒。那时我们都耽心会把他的身体累坏。但面对求知心切的青年同志，他是从不考虑自己的健康情况的。

柴师对宋史，对明清之际的历史和清代学术史，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有《青峰史学论文集》等书即将付印出版。这里所谈的

只是就他的《史籍举要》一书而言。即便是《史籍举要》，我们对它价值的了解也是很片面的。今后再也没有向柴师求教的机会了，只有学习他的遗著，学习他的政治品质和治学态度，学习他对青年的无限关怀，为党的教育事业，为攀登历史科学的高峰而继续奋斗。

北京大学历史系 许大龄

1981年9月28日

前 言

本书的目的，在于使高等学校历史系的学生和有志于史学的青年，在自己能初步阅读古代史籍的基础之上，了解中国历史方面有哪些是重要书籍，哪些应该精读，哪些应该参考，哪些仅备检阅；更进一步了解这些书籍是什么人做的，什么时候做的，站在什么立场说话的，什么时候印行的，它里面记载些什么重要史料，它是用什么方法记载的，这些记载和见解对不对？这些书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我们对这些书应该怎样批判和利用？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应该设置一些专门学科，象史料学、史学史、目录学这一类功课。可是我们教学计划上课程已经很多，不可能用很多时间来讲这许多内容，也不可能对每一部重要史籍都讲得很详尽，只能选择比较重要的，也是常用的史籍来作扼要的介绍。介绍的方法，以史籍性质分类择要来讲，可分下列四个重点：

- (一) 作者及著作时代
- (二) 史料来源及编纂方法
- (三) 优缺点及在史学上的地位
- (四) 注解及版本

这只是大概，具体史书，讲法可以变动，不完全以此四点为限。我们的主要对象是初次接触这些书籍的青年学生，因之对这门课的要求应该合乎量力性的原则，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来考虑。选书和讲解的出发点有三：一是多讲普通习见的书，少讲太偏僻的书；二是讲解力求系统、明白、扼要，不钻牛角、掉书袋；三

是史书源流、史学常识，因事附见，以切实有用为主。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掌握史料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研究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为的是了解前人怎样生活，怎样进行生产和阶级斗争，历史怎样发展，得出什么规律。如何了解这些事情，唯一根据是历史事实。没有历史事实的记录，就没有历史研究可言。这些历史事实的记录，通常我们称之曰史料。史料的范围很广，凡是一切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都是头等重要的史料，可是实物不容易流传到后世，用考古发掘等方法所得的究竟还不算太多，我们还要努力。我们通常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书籍。中国史籍数量很多，说明我国史料是十分丰富的，但这些史料是否都可靠呢，这要靠读者的能力去辨别。关于这些，必须明确以下两点：

一是如何搜集史料。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把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史料尽量搜集起来，这是调查研究工作的最基本的条件。掌握史料，当然要平常多读书，多札记，可是史料太多，时间有限，每一个问题的史料要全面了解是不可能的。如能对中国历史书籍的大概情况有一个概括的系统的了解，知道哪些史料散在那些书中，则是掌握史料的初步工作，这个工作有赖于目录学这一类的知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即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亦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事实上，了解书籍目录源流，确能帮助解决许多问题，至少可少走许多弯路。至于深入细致的功夫，那是钻研不尽的。不懂目录学的人，也可以找到史料，但是不能有系统、有重点、有门径地去搜集；搜集了来，可能不很完全，甚至很重要的倒遗漏了。经验证明，脚踏实地去学习是最稳当、最有效的。

二是如何审定史料。史料有真有伪，有先有后，有同出一源，

转相抄录，有不同来源而事实相反，如何去审定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说明书籍不可尽信。这句话，我们很能体会，一件事情的记载，不深入调查研究，发现不了它的错误。古人有的时候因为立场关系，存心造成错误。因此，凡是一种史料和记载，都必须经过审查考核，从了解写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到写作者的环境和地位，各书比对，发现问题。如果用科学的分析，即用辩证方法、唯物观点、无产阶级立场来分析，就会发现很多史料是歪曲的、是片面的，只看见大多数是记帝王将相的历史，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历史；绝大部分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歌功颂德，或是制订一些压迫劳动人民的规章制度，使劳动人民长期处于被压迫、被统治的悲惨生活之中；即使记载劳动人民的历史，也只是当劳动人民举起反抗的旗帜，封建王朝用尽一切力量来镇压的时候，才不得不写一些人民起义的经过，而这些，结论一定是歪曲的、诬蔑的。至于反映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的创造性方面的材料，更是少了。因此，中国史料虽然丰富，真正我们需要的正确记载，少得很。我们只能从现有的史料堆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剔除糟粕，发现精华。完成这样一件工作，可不简单，一方面要具有高度的业务水平，另一方面还要有高度的政治水平，而政治理论的提高是首要的。

目 录

序	1
前言	1

上 编

纪传体类	1
一 《史记》	1
二 《汉书》	13
三 《后汉书》	21
四 《三国志》	35
五 《晋书》	44
六 《宋书》	53
七 《南齐书》	62
八 《梁书》、《陈书》	66
九 《魏书》	72
十 《北齐书》	81
十一 《周书》	85
十二 《隋书》	90
十三 《南史》、《北史》	93
十四 《旧唐书》	101
十五 《新唐书》	107
十六 《旧五代史》	113
十七 《新五代史》	117

十八 《宋史》《辽史》《金史》	122
十九 《元史》	143
二十 《明史》	152
附：《清史稿》	160

下 编

编年体类	163
一 《资治通鉴》	163
二 《续资治通鉴长编》	182
三 《三朝北盟会编》	184
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186
五 《续资治通鉴》	187
六 《明实录》《清实录》	188
纪事本末类	191
一 《通鉴纪事本末》	191
二 《宋史纪事本末》	194
附：《元史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	197
三 《明史纪事本末》	198
四 《左传纪事本末》	201
政书类	204
一 “十通”	205
1. 《通典》	205
2. 《通志》	212
3. 《文献通考》	216
附：乾隆时所修“六通”和《续皇朝文献通考》	219
二 会要	220
1. 《唐会要》《五代会要》	220
2. 《宋会要辑稿》	222

3. 《西汉会要》《东汉会要》.....	225
4. 《三国会要》.....	228
5. 《明会要》.....	229
三 其他	229
传记类.....	234
一 分类专书	235
二 以朝代为主的传记	244
三 地区性传记	250
四 个人专传	251
地理类.....	254
一 地图	254
二 地志	256
三 水道	260
四 都邑	263
五 边疆 外国	266
后 记	271

上 编

纪 传 体 类

一 《史 记》

《史记》一百三十卷，西汉司马迁撰。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年左右，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一) 《史记》的作者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又曾周游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前108年）继任其父司马谈生前曾任之职为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实践其父遗命，编次著述《史记》。后因替李陵辩解，得罪汉武帝，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完成了《史记》。事迹详《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有两种说法。一是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相信这一说；二是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他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赞成此说。这是一个

疑问，有争论，还值得研究。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文史哲”丛刊第三辑《司马迁与史记》）赞成前说，考证颇细。一般人多同意前说。

司马迁曾官太史令。太史令初名太史公，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自称太史公。《史记》的最初书名叫做《太史公书》，改称《史记》则是东汉末年以后的事。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史记之名，疑出魏晋以后。”陈直《太史公书名考》（《文史哲》1956年6月号）指出，司马迁自定原名为《太史公书》，嗣后西汉诸儒多沿用此名称，故《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书》于春秋类；后来一变而为《太史公记》（《汉书·杨恽传》）；再变为《太史记》（《风俗通义·正失篇》）；三变为今称《史记》。《史记》之名开始于东汉桓帝之时。

（二）《史记》的史料来源 《史记》的史料十分丰富，其来源综合起来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来源是书籍。凡汉代以前古书，司马迁无所不采。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重要材料来源。他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如《三代世表》中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共和为世表”；《六国年表》中说“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穰苴列传》中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十二诸侯年表》中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五帝本纪》中说“予观《春秋》、《国语》”；《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等。这些都表明司马迁是广泛搜集并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书籍资料来从事

著述的。

第二个来源是档案。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谈曾任太史公，后来司马迁又继任此职，因此，汉初档案如诏令、记功册等都能见到，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这一点，也可以在《史记》中得到证明。如《惠景间侯者年表》中说“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传》中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等等都是。

第三个来源是见闻。秦汉史事，对于司马迁来说是近现代史。当时记载有缺，因此多赖见闻。如《项羽本纪》赞中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赵世家》赞中说“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刺客列传》赞中说“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说“苏建语余曰：‘……其为将如此’”；《太史公自序》中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这是得于所闻的。《李将军列传》中说“吾睹李将军俊俊如鄙人，口不能道辞”；《游侠列传》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这是得于所见的。《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说唐予冯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酈生陆贾列传》中说“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田叔列传》中说田叔的少子“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这是得于交游的。这些从见闻和交游中得来的材料，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第四个来源是游历。司马迁为了著《史记》，曾经登涉名山大川，访求史迹。如《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崆峒，北至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适长沙”；《龟策列传》中说“余至江南”；《淮阴侯列传》中说“吾如淮阴”；《伯夷列传》中说“余登箕山”；《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观蒙恬

所为秦筑长城”等等。这些反映了他足迹所至几乎遍及全国，也说明了他周游各地与写作《史记》的密切关系。

《史记》的史料来源很丰富，然而就各个历史时期来说，史料的多少又很不平均。春秋以前间有缺略；春秋战国至秦比较详细；汉建立后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则详尽记载，篇幅最多。也就是说，时代越近材料越多。对于上古史事，司马迁当时已有文献不足之叹。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称：“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自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这个评论是对的，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司马迁据以写史的材料前少后多所致，我们自然不能苛求于他。

（三）《史记》的编纂方法 《史记》以前的史书，《尚书》只是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还算不得是正式的史书；其他如《竹书纪年》、《春秋》、《左传》等均是按年月日的顺序编写的；《国语》、《战国策》则是分国编写的。《史记》的编纂方法在当时具有独树一帜的首创精神。司马迁创造性地以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事实。这种方法，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以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方法，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所修“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体例，共分五种：

甲、本纪 共十二篇，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朝代为主，象《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另一类是以帝王为主，象《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不论哪一类，实际都是编年史，是大事记，等于全书的总纲。项羽虽非帝王，亦称本纪，这是因为秦亡之后，项羽“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